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最新力作
最具争议性的出版物之一

HZ Books
华章经管

全球化 及其不满

(美) 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著
(Joseph E. Stiglitz)
夏业良 译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由于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直接目击了全球化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这些国家中的穷人）所产生的毁灭性影响。

——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全球化 及其不满

(美) 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著
(Joseph E. Stiglitz)

夏业良 译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opyright © 2002 by Joseph E. Stiglitz.

EISBN: 0-393-05124-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China Machine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W. W. Norton & Company, Inc.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全球独家发行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03-87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及其不满 / (美) 斯蒂格利茨 (Stiglitz, J. E.) 著; 夏业良译. -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3

书名原文: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SBN 7-111-13518-0

I. 全… II. ①斯… ②夏… III. 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研究 IV. F1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111515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 师冬平 版式设计: 刘永青

北京瑞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17印张

定价: 38.80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作者中文版序

我非常喜悦地看到自己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中国在本书的中心主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我认为全球化（世界各国更加紧密的一体化）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种挑战。当各个国家形成其自己的经济政策并且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时，全球化可以是收入之巨大增长的基础。如果这些国家崛起应对这样的挑战，它们就可以确保收入增长的利益被广泛分享，从而使贫困得到减缓。

中国已经做到这一点。它的增长一直是建立在设法进入国际市场的基础之上，它已经拥有巨大的出口额，并且已经以其自身的条件，吸引了外国投资者。而这些外国投资者已经做出了反应，使中国成为发展中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接受国。它还利用全球化来缩小它与更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其经济战略已经得到了偿付：根据官方统计，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真实GDP增长了542%，农村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4.6%。

中国的成功在国际贸易体系（international trading regime）背景的衬托下给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而这种国际贸易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总体上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尽管自己到处宣称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益处，欧洲和美国却仍然通过配额的使用来限制中国的纺织品出口。

在本书中，中国在每一主要的议题中作为一个参照点而出现：在转型、发展和危机管理方面都是这样。在上述的每一个例证中，中国提醒世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倡导的政策之外还存在着可供替换的政策，这种可供替换的政策被证明是大为成功的。

当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历着收入下降，贫困激增时，中国的收入显著增加，贫困率下降。当东亚和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严重的衰退以及在那些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处方的国家出现大萧条时，中国的增长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当那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遵循“华盛顿共识”政策时，它们的增长不过是刚刚超过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改革前时代增长水平的一半而已。甚至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和韩国的收入都是以令人刮目相看的速率在增长。

中国所做的许多事情只不过是根据常识行事——并且是与标准的经济理论相一致的。在此危机期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避免了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高利率——而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标准特征，而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建设所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随着短期内收入得到增强，较长时期增长的基础就已经被奠定了。他们关注就业和企业的创办，而不是仅仅对旧企业（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进行结构性调整和改造。此外还存在着一种实用主义：个人责任制也许并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欲求的私有化之“纯粹”形式，但是它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提高。乡镇企业并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荐的“纯粹”私有企业，但是它们却在转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本书的主题之一是，激励是有作用的，但是如果游戏规则没有被正确地设定，扭曲的激励就会导致资产的剥夺，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在俄罗斯，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允许资本相对自由地流入和流出该国——高利率，法律规则的缺位，以及资本可获得性的缺乏，都意味着剥夺资产比创造财富更加有利可图。

中国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它近年来强调金融制度（比如股票市场）创建和“法治”的原因之一。将来还会不断有对于诸如竞争性政策、破产法和市场经济所隐含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其他方面问题的关注。只要有对适宜进程、公开和透明之法律程序的强调，就会出现从“法制”（rule by law）到“法治”（rule of law）的过渡。

中国经验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方面是，一直存在着一种努力，保持对发展和转

型之终极目标的关注：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还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平等和可持续的增长。至少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忘记社会正义和休戚与共的重要性。当中国沿海地区的增长极为迅速之时，也存在着对西部省份和东北以及对农村地区生活水平的真诚关注。我本人曾经有机会亲眼目睹旨在提高贫困地区生活水平的某些计划的实施情况。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会出现对这些传统价值的歪曲，而我希望本书能够加强中国的决心。

根据同样的象征，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将会出现中国城市居民的不断集聚，这就迫切需要确保这些城市是适宜生活和居住的，并且对环境予以特别的关注。成功的发展并不总是要模仿，它涉及从他人的成功和失败中学习，从西方许多失败的城市发展经验中可以吸取到许多有益的教训，这些失败包括：没有公共交通、没有公共生活福利设施、没有社区的感受。

我在本书中所强调的许多教训不仅说明“以不变应万变”（one size fits all）的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国际金融机构所试图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政策，明显不同于那些成功的西方国家实际上所做的事情。它们自己在追求实施产业化政策，促进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然而却并不鼓励发展中国家这样做。它们维护着公共社会保障体系，然而却鼓励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实现私有化。向别人学习包含着比听取他们所说的更加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要求仔细地观察他们在怎么做。

我在本书中所强调的另外一个主题是，国际机构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它们在许多方面是不民主的。它们经常是不透明的，而且有许多决策是关起门来进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它们未能倾听发展中国家或者至少对它们做出反应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具有不民主的本质。这一点对于中国自己未来的政治演进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中国的成功意味着它将在全球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我强烈地批评国际经济机构，指责它们的不透明和不民主的治理，指责它们不能对发展中国家的观点与关注提供充分的声音，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的声音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其声音的增强，中国有必要为发展中国家清楚和强烈地阐明自己的观点。

如同我所强调的那样，政治的全球化并没有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一致，社会正义和休戚与共的感觉往往停留在某一国家的边界。中国所处的地位是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角色，不仅表明发展存在着可供替换的选择，一种不只是能够把繁荣带给少数人，而且能够把繁荣带给绝大多数公民的战略。但是作为一个成功的国家，它所需要的是，不能忘记那些落在后面的人们。它可以主张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坚持游戏的国际规则不应当由西方国家中的特殊利益群体所制定，而是应当与平等和公平的原则相一致。

在本书初版后的一年半中发生了许多事情，而从我开始撰写本书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就更多了。我认为，本书已经对转变思想倾向做出了贡献：如今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这一争论已经明显不同。有一种认识是，虽然全球化可以是（如同在中国所看到的那样）一种积极的力量，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它还没有达到其潜力；在许多地方，它实际上已经引发了贫困。

问题并不是人们是否应当支持或者反对全球化，而是我们应当如何使得全球化发生有益的作用，应当如何对游戏的国际规则以及国际机构进行改革？在某些圈子里，习惯的说法是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对全球化感到不悦的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它，就像吃药那样痛苦，然而却对他们有益。但是全球化并非不可避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曾经有过从全球化中撤出的先例——并且如果我们不能使得全球化更加有益，就会出现回潮。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种认识是，他们已经对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了过度的限制性，并且亚洲国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过度的财政节俭。在阿根廷的外逃式紧急援助失败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发生在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巴西和俄罗斯的外逃式紧急援助的失败，他们已经开始更加认真地考察可替换的选择，比如说破产和停滞。

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政策（这是他们长久以来一直所倡导的）是具有误导性的：它既不能提高增长也不能增强稳定性。这就是一种进步，虽然还没有对更加根本性的难题有所作为——比如说与全球储备体

系产生联系，或者发展中国家仍然落在后面，承受着汇率和利率易变性的冲击。

如今几乎没有人捍卫过去的的不平等贸易协定，包括1994年所达成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新一轮贸易谈判于2001年11月在多哈开始，它被看做是对过去的贸易不平衡的矫正，被看做是一轮“发展回合”（Development Round）的谈判。但是美国和欧洲违背了那一承诺。

但值得庆幸的是，在坎昆，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它们明白没有协定可以比另外一个协定更好，因为先前的协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直都是不利的。中国必须继续表明它与巴西、印度、南非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休戚与共的，以确保如果有一个新的协定，它就应当反映出发展中世界的关注和利益。这也许使中国有必要对其自己的利益做出牺牲。世界场景正在变得足够庞大，它也许能够帮助达成一项交易，该交易会推动其自身的关注，以更加贫穷的国家为代价。但这将是一种失误，并且将是短视的。

从长期来看，中国和世界将从那些能够对世界上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国际协定和国际机构中获益。只有到那时，全球化才能够达到其促进世界上所有国家可持续与平等发展的潜力。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2004年1月于美国华盛顿特区

代 序

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化中受益： 中国的经验与教训

樊 纲^①

近几年，从西雅图到墨尔本、从蒙特利尔到坎昆，凡是有发达国家首脑和跨国公司总裁们开会的地方，总会看到举着反全球化旗帜的游行队伍。不过，游行队伍中似乎看不到中国人的身影。这一方面可能是中国人拿不到签证来这些地方，另一方面可能是中国人已不大习惯于上街游行了，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自改

① 本文是我2003年10月在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全球化的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全球化中受益：中国的经验与教训”的主要内容的缩写。斯蒂格利茨教授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专题演讲，讲的正是我们面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正因如此，当出版社的编辑请我为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这本书的中译本作序的时候，我想用我在那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作为“代序”，可能正好起到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本书的内容，更好地将这本书的观点与中国的实际相联系的作用。有人可能会问：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批判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观点与做法），你为什么也不批判全球化，而是去研究如何从全球化中获益？我想这也与我在文章中所分析的一个问题有关：我和斯蒂格利茨教授的现实背景存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当然也有很多的理由去批判全球化（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批判国际组织的错误政策和发达国家的自私自利，但是那样做会让人觉得你是“弱者的抱怨”，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换句话说，作为落后国家的经济学者，在这个就是以弱肉强食为基本逻辑和客观规律（我们不必为此而大惊小怪！）的世界上，你都“没有资格”去批判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而斯蒂格利茨教授批判全球化，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是美国大学的教授，主流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当过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不仅了解“内幕”情况，而且不会被认为是在利益的差异。不是说我们批判全球化就完全不起作用，但很少会被人认真对待，而只有斯蒂格利茨的批判，才是最有力量的，因为这是“来自内部的批判”。不过，在解释了以上问题以后，我还要指出的是，我之所以认为用我的这篇文章作为这本书的“代序”是合适的，是因为我们要看到，斯蒂格利茨教授并不是简单地在批判全球化本身，而我们中国也的确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了发展。所以，我的这篇文章，也许可以为理解斯蒂格利茨教授这本书，提供更多一些思考问题的角度，使我们对全球化问题的分析更全面一些。

改革开放以来，贸易、外国直接投资（FDI）与经济都保持了很高的增长，而加入WTO第一年（即2002年），中国的贸易占GDP的比重就超过50%，增长速度超过8%，FDI引进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似乎在受益于全球化而不是相反。

但其实在另一面，中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不到1 000美元的发展中大国，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薄弱环节，面临全球化的冲击，也可谓风险重重；中国也还远没有强大到能够左右全球化规则的制定从而使其符合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怎样能够避免全球化的风险而在全球化中受益，仍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本文试图对中国在过去25年中开放经济、加入经济全球化的经验与教训做一些简要的回顾与分析，或许这能为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化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也为中国下一步应对全球化的新挑战，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

要想得益于全球化，首先要下决心深化内部的体制改革

25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包括在受益于全球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这些成就的取得首先不是来自开放，而是来自于一系列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这包括：发展非国有经济，推进国有经济的民营化，放开价格，放松管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政府，下放权力，健全法律体制，等等。

对中国这样既是体制转轨国家，又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首先要做的事情不是国有部门的民营化，而是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正是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使得国有部门的真正改革成为可能，因为非国有部门创造的大量就业可以吸纳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非国有经济的增长也使得在国有经济因改革而不增长甚至下降的时候，保证中国经济仍能持续增长，现在也逐步发展起了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机制。

国内改革事实上为经济的开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一方面，国内民营部门的发展以及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要求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建立与完善，这些制度性设施的改善为吸引外资奠定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分权化改革也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在其辖区内提供更多的就业与财政收入，有激励为吸引FDI与国内投资而互相

竞争，从而促进各地方投资环境的改善。

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制度变迁还远没有完成，但以上这些进步在中国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无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有人提出，如果中国采取更为激进的改革（如政治改革和金融改革），应该会更成功。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不过，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应该首先考虑以下几点：

首先，为了在全球化中受益，发展中国家先要做好自己的“家庭作业”，即把国内的事情做好。

其次，改革政策与方式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模式。

其三，改革还要考虑到社会稳定。如果改革导致持续的动荡，就会削弱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吓走外资，从而影响到下一阶段的改革与开放。

其四，改革政策之间可能会出现不协调（incoherence）。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过激”，一个是“体制瓶颈”。中国之所以没有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是因为没有在各方面还未曾准备好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不过，中国虽然避免了早熟的改革，但受到改革瓶颈的制约。比如金融改革与政治改革的滞后就会妨碍未来的中国发展。正是在这些方面，如果更多一些改革、走得更快一些（但不是要一下子搞金融开放、资本自由流动），可能会使中国更多地受益于全球化。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是经济开放的首要环节

FDI在中国受益于全球化的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可能是最重要的角色。引进FDI，首先意味着引进落后国家稀缺的资本与利用其富余的劳动力；其次，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要求合资的外商转让其先进技术作为条件，这种技术引进的溢出效应可以带动国内的技术进步。另外，在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中，还包括相关的商业与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模式。FDI在贸易、固定资本形成、就业创造以及技术进步等各方面都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FDI还扮演着游说集团(lobby)的角色,在改革的最初阶段,是推动改革的一股积极力量。与国内投资者比起来,外资显得更有积极性也更有能力“游说”(中央或地方)政府,使其政策与制度变革更为市场化,更能与国际接轨。并且,在许多场合,他们甚至可以到国际上游说以维护其所在国的利益。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的开放要十分谨慎,各种金融服务业以至整个金融市场的开放,就可能更是要放到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再提上日程,但是它们似乎可以尽快地开始吸引对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这种投资所带来的风险较小,而益处很多。

中国迄今为止已经吸引了5 000多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所引起的惟一种金融风险是可能在一定时期之后,发生大量的投资收益汇出。据粗略估算,外资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只有10%左右已经汇出,也就是说,有90%左右的利润收入(2002年底大约为1 10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当年外汇储备的39%)已作为再投资留在了中国,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随时汇出这些利润的“权益”,一旦中国经济中发生什么动荡,这些利润集中在短时间内大量汇出,对中国的金融稳定会是一个威胁。但是,总的来说,目前这种威胁不大,这种情况一般也不大会真的发生。

适当保护幼稚工业, 渐进地开放产品贸易

传统的用来论证自由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用于分析存在巨大差距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不合适,关键是无法论证这种自由贸易是否能使落后很远、而且处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自由贸易关系中获得发展。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可能在所有方面(尤其是在新兴产业与高科技方面)都占优势。后发国家如果一开始就实行自由贸易,尽管可能在短期内获得一些初级品产业部门的增长,但最终只能专业化于这些初级品产业部门或低端产业部门,从而长远来看,在人均收入及经济结构方面都无法赶上发达国家。正因为如此,早在19世纪上半叶,李斯特就提出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而且,自由贸易理论一直无法解释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为什么没能使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实现收入水平的“趋同”。

对于幼稚产业的保护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全球化时代，并不是所有的要素都是流动的。资本、技术以及“人才”都是可以流动的，但是，普通的蓝领劳动力却不能流动，只有资本与技术到发展中国家去“利用”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同时，在技术市场上，流动性也是有限的。有的人说只要资本与技术是流动的，最终趋同就会发生，但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学却告诉我们，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希望通过知识产权来保护新技术以及高附加值的产业，并尽量把它们保留在本国境内。那些可能被重新配置的、按梯度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只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是一些采用没有知识产权保护限制技术的产业。尽管国际贸易与FDI的溢出效应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禀赋，但是由于初始的教育与研发能力差距之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差距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扩大，并且全球的劳动分工也会导致穷国处于一个劣势的位置，尤其在技术革命时代，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要比发展中国家知识禀赋的改善快得多。

13年的WTO谈判以及关税的不断下调，足以表明中国实施贸易保护的艰难。中国的贸易保护是保护幼稚产业而非全面保护市场。以家电业与汽车业为例，这些产业对外资的开放是较早的，但关税的下调是逐步的，不是一下子实现自由贸易。正是这一保护期使得这两个行业得以在中国弱小的市场上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积累起了面对更大竞争的能力，否则，如果一开始就放弃关税保护，很难想像这两个产业能在中国发展起来。

这种“开放中的保护”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一方面对消费品实行高关税，另一方面对于进口技术与设备采用关税优惠政策。也就是说，先让生产者享用自由贸易的好处。这正是中国“名义关税”与“实际关税”有差别的原因所在。很多国内企业与外企享受到关税优惠政策的好处，加快技术更新与转让，有助于中国企业加快赶超。发展中国家应把生产技术能力的发展始终放在首位，而不是仅仅注重短期静态均衡意义上的消费者效用或福利的最大化。在发展之初，在大量的能够提供高工资的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之前，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是很小的。只有在一个国家成为国际市场上越来越重要的供应者的时候，消费者市场才会是可持续

续的。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希望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在全球化中受益，那么在开放之初，让生产者首先享受自由贸易的好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不能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和放弃资本管制

中国在1998年实行了经常账户自由化，但资本账户一直没有开放。这大概也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没有最终波及到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资本账户自由化，有很多支持的理由，一个基本的理论逻辑是：金融市场化的自由化越早就越能更多地吸引外资。不过，如果一个国家在政治制度、法律框架、产权结构、税收、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体系的健全以及市场规制等方面都还没有做好准备，那么，这种开放的风险成本就会非常高，会大大高于前面所说的那个好处，因此是不合算的。在中国的条件下，由于体制上的漏洞，即使仍然保持着资本管制，仍然会有很多漏洞使得资本流动在当局控制之外。如果把误差与遗漏看做是资本外逃数目的近似替代，那么，可以发现，从1990~2001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达到最高），资本外逃的数目是非常可观的。很难想像，如果资本账户自由化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及转型阶段，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的一个理由其实是“反腐败”。如果资本外逃很容易的话，腐败就会变得更加容易，而如果资本管制严格，缺少资本外逃机制，腐败得来的钱没有渠道汇到海外去，而在国内花费“脏钱”又有风险的话，就可能削弱腐败的动机。一些发展中国家自由化以后出现投资及GDP增长的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导致大量的国内储蓄流失。对某些国家而言，对资本的控制就是对腐败的控制。

很难说资本账户自由化一定是改革的最后一个环节。但可以说，越是复杂的市场，越是流动性强的要素（如资产），自由化的进程就越是要放到整个体制转轨的较后阶段。

高度重视发展教育

教育不仅有助于增长，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受益。在最基本的层

面上，由于外资企业技术的相对进步及对劳动者素质的高要求，只有那些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劳动者才可能进入由外资带来的生产体系。而缺少基本教育的劳动者则可能被边缘化，只能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而非受益者。

比起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教育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因为中国一直以来有着重视教育的传统。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基础教育也有相当的改善。目前的问题是政府如何真正在全国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帮助广大农村地区的学龄儿童接受基本的教育、掌握基本的技能，从而使得他们能够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合格劳动者。

中国能在全球化中受益还得益于向海外派出大量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往往就是外资与中国之间的桥梁，此外，他们对于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对国际社会而言，也应把教育作为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首要内容。

认清自身利益和自己的特殊发展阶段，自主制定发展政策

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跨国公司推动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是被动的游戏参与者。这些跨国公司以及它们的国家，能够有很多方式“说服”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使得政策制定对它们有利。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不是服务于本国人民而是这些跨国公司，那么，这个政策就是非常危险的。

一个好的政策，首先是考虑本国自身利益的自主的政策；其次，这个政策要基于对本国国情的了解；再者，这个政策要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视野。独立的政策制定也意味着拒绝过于理想化，做那些发达国家才可以做的事。比如，覆盖每个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果政治家为了讨好选民，采纳了这一政策，结果就可能导政长期的停滞与金融困境。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例子。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避免进入“洋跃进”的陷阱，或者把发达国家的政策与体制当做自己当前的模式。当然，发展中国家可以把发达国家当做未来发展的模式，但是在当前马上照搬这些模式是很危险的。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策思想（这不仅是商业与贸易的安排，还有政

策决定的议程)是由发达世界主导的。需求、原则和标准都是由发达国家先产生出来,然后灌输给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所谓的“全球问题”,实际上也首先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然后被它们大力推动,被国际组织和各国的“国际化”知识分子接受为“全球问题”。发展中国家不是要完全排斥这些“全球问题”,但要非常清楚自己与发达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利益和条件的判别,不能简单地把发达国家所重视的问题也当成自己的首要问题。

国际组织和“国际顾问”往往做出错误的、有害的政策建议,往往是由于这些建议没有历史观念的基础,忽视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一些发达国家的专家或顾问也完全出于好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他们建议的出发点可能都是好的。不过,很多时候,这些外国专家或顾问们往往忘却了历史以及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阶段。事实上,所谓的全球化问题首先是发达国家的问题或者是发达国家过去几个世纪经济增长的结果。作为后来者,发展中国家无疑首先要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犯错误、走弯路。但必须承认,有些发展阶段或者说“历史阶梯”是不可逾越或“省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发展中国家政策参照的历史或许不是当前的而是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发达国家。历史总是被遗忘或有意被遗忘,但对于制定发展政策而言,它们确实是非常关键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绝不能忘记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

小结

本文想以中国为例研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全球化中受益。这里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不管全球化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冲击与风险,它都是一个我们主宰不了又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你喜欢不喜欢它,它都在发生,都在对你产生影响,你只能在它存在的前提下,思考和实现你自己如何发展。所以,仅仅是批判、抱怨全球化是一点用都没有的,你只能想办法去利用它。而且,诅咒魔鬼是容易的,建设性地思考如何从“魔鬼”那里受益以打败魔鬼,是最难的。

从全球化中受益需要有一系列的政策组合与制度安排。没有哪一个单独的政

策能在没有其他政策的配合下充分发挥作用，但只要有一个政策出问题，就可能导致全盘皆乱。这就是政策配合的难度。各国之间的差距越大，世界越是全球化，发展就越困难，对于趋同的条件就会要求得越严格。仅有廉价劳动力并不能支撑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国际社会应该有一种紧迫感，把发展当做全球化议程的头等大事。不过，首先应该是发展中国家自己把事情做好，深化国内的改革，在自己的发展政策上不犯各式各样的错误，说到底，发展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事情，别的人谁也依靠不上。

在这篇短文中，我们以中国为例，分析了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注意事项”。在此一定要注意的，中国的做法有其特殊性，同时中国也走了许多弯路，并且，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还面临着巨大挑战与新的冲突。尽管如此，至少目前来看，中国还是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化中受益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案例。中国的发展，可能也会对其他国家提供一种激励——连中国都可以从全球化中受益，还有谁不能呢？